

民族的构建

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加]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加] 施恩德 (Andre Schmid) 编

陈 城 等译

Nation Work

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民族的构建

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加]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加] 施恩德 (Andre Schmid) 编

陈 城 等译

戴联斌 校订

Nation Work

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 (加)卜正民, (加)施恩德编;
陈城等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8

ISBN 978-7-80720-710-8

I. 民… II. ①卜… ②施… ③陈… III. 民族历史—研究
—亚洲—文集 IV. K30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8611 号

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责任编辑:武 学 崔 凯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巍

校 订:戴联斌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100052)

发行电话: 010-63106240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0-710-8

定 价: 43.8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Nation Work: 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by Timothy Brook and Andre Schmid, Editors

Copyright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Jin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说明

这部《民族的构建：亚洲的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是多位西方亚洲史专家经年研究的成果合集，书中各篇，观点亦并不相同。然而一家之言，亦可借镜，将这一主题的研究介绍给国内学界，期望引起批评与对照。

本书的作者都是西方学者或来自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们关于部分历史命题和理论命题的个别观点并不准确，我们在编选过程已尽量做些文字处理和调整，但是，过多的改动，无疑会大大损害原作的完整性，故而，亦基本保留其风貌，以此为中国学术界提供相对完整的理论借鉴。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能保持审慎的拿来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偏见和错误。

作者简介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有著作 14 种,其中已译为中文出版的有《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和《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施恩德 (Andre Schmid)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国史教授。著有《帝国之间的韩国, 1895—1919》(*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苏珊·伯恩斯 (Susan L. Burns)

美国芝加哥大学日本史副教授。著有《国家之前:国学与近代早期日本的共同体想像》(*Before the Nation: Kokugaku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拉温迪伦 (V. Ravindiran)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南亚史副教授。

王国斌(Bin R. Wong)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著有《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养民》(*Nourish the People: The Civilian State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合著)等。

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拯救国家: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现代化》(*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和《从帝国到民族国家:1850—1950年代的中国经济思想之变迁》(*From Empire to Natio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n Transition 1850s—1950s*,即将出版)。

李小平(Xiaoping Li)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奥卡诺根学院(Okanagan Campus)社会学教授。著有《高涨的声音:亚裔加拿大人的文化激进主义》(*Voices Rising: Asian Canadian Cultural Activism*)。

托马斯·基尔斯特德(Thomas Keirstead)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日本史副教授。著有《中世日本的权力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in Power Medieval Japan*)。

导论:亚洲的民族和身份认同

..... 卜正民 施恩德 1

构建国体:19 世纪日本的公共卫生与民族

..... 苏珊·伯恩斯 19

关于权力授予的论述:德拉威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传教士东方主义

..... 拉温迪伦 59

脱离“中央王国”:1895 年到 1910 年间朝鲜民族主义思想中的

中国问题 施恩德 98

两种类型的民族,什么类型的政体?

..... 王国斌 128

经济民族主义:30 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

..... 曾玛莉 146

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

..... 卜正民 183

民族建设的不连贯性:中国“后民族主义”探究

..... 李小平 221

日本的民族和后民族: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历史观念

..... 托马斯·基尔斯特德 252

参考文献 277

译名对照表 307

导论：亚洲的民族和身份认同

卜正民 施恩德

在 20 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粗略地讲，民族国家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藉以认识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厕身的世界；在当代意识中，它则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概念，变得非常复杂，很难想像有一个时代，所有依附于民族国家的东西不是作为原动力或道德责任来称扬的。在世纪末，当民族国家都被正义信念所武装，民族国家间动辄因对方而动怒，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是很难想象的。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

然而，近几年来全球化的爆炸性发展已经引起了哪怕是最忠诚的民族国家倡导者的注意力。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一种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力量早已影响着 20 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形成，但它现在的力量是绝对强大的，不容置疑。如今，全球资本流通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某些习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民众不再局限在特定的国家疆域，关于人权和生态破坏的话题超越了任何单个国家的范围。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国

家边界似乎不再成其为限制,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样的边界已经不存在。民族国家正在逐渐丧失将贸易和信息流通控制在其境内的能力。商品和服务,以及它们的提供商和消费者,既顺着民族国家边界不断发展,也超越了这一边界。从事跨国经济行业的人并不是无视国家疆域。当这种合作是有利的,他们就与国家金融机构一起工作,遵循着资本和劳动力的组织原则。而一旦脱离这种体制更有利,他们就会轻易地将之抛弃。随着跨国公司、货币集团盟组织和自由贸易区持续发展壮大,民族国家作为财富收集、积累、消耗和计算单位的显著性进一步被削弱了。正如民族国家作为经济单位的特征在削弱,它作为人类认同的出发点的力量也在弱化。沿着资本的流通和当年殖民时代留下的渠道,绵延不绝的移民潮使得纽约的古巴华裔餐馆和香港的锡克教徒看门的一韩国烧烤店一样不足为奇。

是否这些意味着民族国家正在衰退呢?如果我们将这些互不相关的事实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排列起来——放弃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亚洲,而是相反——我们可能会发现这种民族国家衰退论更多代表着西方人的想法,而不是亚洲人的。这并不表示全球化在亚洲影响有限——实际上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世界经济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已经很长久了。确实,尤其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亚洲国家深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也许某些亚洲精英还抱着那种假想,认为国家可以在主权这个坚硬贝壳里生存。除了官方还持有这样类似避难王国的论调之外,这种假想只在极少数国家出现过非常短的一段时期: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或者今天的朝鲜。整个 19 和 20 世纪,亚洲国家的边界已经从很多方面被渗透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外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传教士的宗教劝导,在国外关税法则管理下的大规模贸易和对外国文化的追捧。这些力量既渗透了也勾画着国家边界线,它所形成的疆域正是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地理空间。有

时候这些民族抵制全球化的力量,有时候与这些力量微妙地搅和在一起,但从不曾与这些力量分离过。亚洲民族的现代史与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且这还远未结束。

亚洲民族国家在全球压力下的脆弱性并不意味着东西方关系是亚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的唯一动因。本书并没有提到那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所谓亚洲殖民国是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开始寻求民族自主的。我们更多关注亚洲民族国家形成民族身份的历史过程。在任何一个亚洲民族国家,这个过程都包含着众多国内外人物和思想的活动,而不是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仅仅是在西方入侵下的亚洲民族的反应过程。正如本书中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所谈到的,在日本、南印度、朝鲜和中国,不同的精英团体往往使用不同的策略来修饰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西方的影响仅仅处于次要的地位。东西方分化的概念尽管常常在现代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但往往只是个背景,尤其在亚洲出现分裂和纷争的历史时刻它就削弱了。Edward Said 曾有过著名的论述,指出东西方的分歧以一种本体和认识论间的分歧潜在于我们对东方的认识中。但是在本书中,由于作者们是以亚洲人的立场站在最前沿去观察亚洲民族主义,从而避免了这种潜在偏差。

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分歧

在全球体系下,亚洲民族国家形成了它们独特的现代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仅仅是根据亚洲精英阶层的兴趣,以及他们影响国家政策和国家定位的能力而形成的。通过对文献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从事该工作的个人及团体的考察,本书的作者们追踪了身份认同有利于公共舆论结合的过程和世界体系中亚洲再结盟的特殊历史时刻资源配置的过程。为了把握这项工作

(work)(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构建 nation work)的特点,有必要将我们的视线从传统的东西方划分转到亚洲国家内部的其他三类分歧。

首先是性别、阶级、地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分歧按照各党派和那些经常散伙又重组的精英联盟的意思建立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这些党派和精英希望用他们眼中的民族国家观来动员人民,而他们对民族国家的定义往往与反对方的观点有激烈的冲突。在这里,民族国家变成了什么(或者什么变成了民族国家)的问题取决于地方上的权力构成。这并不仅仅是通常所问到的“谁代表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哪个集团能够在竞争中上台获得发言权。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这些权力构成在其重要性上超过了那些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常见的全球体系下更广泛存在的对权力的关注。如果所有的政治都有地方属性,那么民族国家政治也一定是的,即使是在全球体系内。正如大部分论文所阐述的(至少是暗示的)那样,受过教育的城市男人掌握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公众对国家认同的认识程度。对民族国家的探讨几乎是男士精英的“垄断企业”。通过对知识生产途径的控制,以及有时候他们在政府系统里的官位,这些精英男士可以垄断对民族国家的解释权。他们往往将本集团的利益与特定的对民族国家的解释结合起来,几乎不留任何空间给公众去接触不同的声音。

第二类分歧存在于多边世界秩序下的民族国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亚洲精英们一直为他们国家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而谈判。对这些国家精英而言,他们的亚洲邻居(无论是与之接壤的主权国家还是企图争取独立的国内分裂势力)对他们的自我认识常常起很大作用。跨文化的特征描述在亚洲由来已久,例如中国的历代正史里都有“外国传”(外传)。对亚洲“异族”的特征描述模式往往被视为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兵器库

之一。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亚洲学者们就已经很擅长此道了。从19世纪开始,这种描述的历史就被证明是对精英们有用的。因为这些模式的内容和目的会因当时的新变化而改变,从而可以被用来就民族国家提出新的主张。尽管以前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是现代亚洲民族国家的主要“他者”,本书中至少一半的论文将这个角色给了亚洲邻邦——中国改革派眼中的日本,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南印度地区活跃的德拉威人眼中的婆罗门,以及朝鲜记者眼中的中国。由于刚刚进入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亚洲精英们仍然还在专注研究他们的邻国特征,以便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使他们的民族区别于邻国从而应该成为一个国家。

第三类是那些将当前与复杂的过去分开的分歧。这也是亚洲内部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工程经常主观地叙述过去的历史,以迎合民族主义者现在的目标。因此,本书的作者们将焦点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个人或者团体致力于从历史片断中重新挖掘国家身份认同的不同层面,同时有意无意地用种种修辞手段转移人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注意力,比如将其称之为重新发现、复苏、进化和进步,或者本质和精神。历史叙述为这个目的提供了一个没有来源的故事,因而将现在与某个遥远的过去联系起来,因为这个活动从前至后都被视为历史长河中的自然进步,并非仅是他们民族而是所有民族的。作为历史叙述的对象,民族本身并不被视为历史的产物;相反,历史被弄得像是民族用来揭示自己的媒介。这本书的所有作者都关注了过去与现在的分裂,方法是通过研读那些评论家、政治家、学者和记者们认为对提炼出民族很必要的历史材料。通过对民族主义著作的严格检查,他们不仅证明了民族和身份的历史可能性,还点明了历史阐释是如何隐藏这种过程。这些阐释没有局限于延伸至很长历史时间段的复杂叙述,还可以通过掌握旧的语言来申明新

的权利。将一些意义庄重的字组合成一个新的词语概念;对古老的词语进行革新,注入新的含义;对经典著作的激进解读;诉诸一个地理位置,甚至占据这个地点,以象征性地回应历史时间。所有这些手段都可以赋予民族国家对历史的权威性。这样精耕细作,建立和割裂与历史的联系,就掩饰了民族身份认同中某些方面新增饰的东西。

要强调民族身份在亚洲的本地特色,像我们在这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并不是要在亚洲和西方民族之间设立一个不可化解的两极对立,也不是要在这些身份或创造他们的过程中暗示一个假想的亚洲统一体。如这本书中的文章所证明的,尽管亚洲民族从他们共有的被殖民经历中得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民族主义精英用不同的安排和多种方式记录和组织了这种经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称得上拥有的历史共同点的不过是如下的矛盾:一面为从西方手里独立而斗争,但同时又用一种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来装饰他们民族的形式和身份。一方面,这些对民族的不同看法在亚洲本土环境中被表述出来,但是这些表述的外在形式的特征是主导世界体系的西方意识形态所推动的标准和期望。英雄为什么被赞扬,语言是如何产生的,领土的观念是否被唤起,历史叙述中被赋予了哪些内容——一句话,所有提供了民族身份得以成立的条件的整套符号和主题的体系——在民族与民族之间都不相同,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团体之间也不相同。但是,精英们之所以写了这么多而广泛的有关以民族为中心的身份认同的作品,其推动力正是融入和积极参与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民族是它的基本单位。

民族主义的精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权衡本土与全球、我族与异族、现在与过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工作,就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内容。本书所录个篇,研究方法不一,与具体背

景也有密切联系,但都表明,在任何时候,这种民族构建的工作,可能涉及广泛的各种各样彼此关联又得同时并举的具体事项:不断地阐释;传承和延续文化,作严谨的学术研究;创造新的象征,并赋予它们以民族的意义;建设各种表现形式;向海外“拿来”各种民族形式和民族思想;与敌对势力做斗争——同时还要努力向尽可能多的受众传播和灌输他们的工作成果。

对民族的再思考

亚洲民族与在西方殖民主义之前就存在的共同体存在着联系,但又受到不同程度的殖民地经历的影响,它们是重新审视早期有关民族方面的学术观点的绝好场所,这些学术研究主要是基于欧洲的个案研究。这种再思考在1980年代有关南亚的学术著作中体现得最明显。早在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前,西方的亚洲研究学者,比如 Benedict Anderson([1983]1991),亚洲的亚洲研究学者,比如 Partha Chatterjee(1986,1993),以及在国内外的亚洲学者,比如 Homi Bhabha(1994),都在致力揭示现代世界中民族的殖民/欧非混血的性质,指出民族在西方之外的世界中所扮演的矛盾角色。它们之涉足这个领域,源于艰难的世界局势下亚洲各民族面临的特定处境,其结果是导致对宗主国与殖民地、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多重关系重新审视,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

质疑民族的冲动是最近才在亚洲发生的现象。在过去的超过一个半世纪里,无论是民族主义的精英还是研究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都没有质疑民族和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独立斗争所反对的内容之一。依据活动家和学者都在使用的有关现代性的目的论式的叙述,民族成为了唯一合适的单位,能够从帝国主义手中获得独立和重新获取那些殖民统治者挪到

亚洲之外的宗主国里去的财富。如果民族国家——国际法定义为主权单位——组成了主导全球交换的国际关系,那么殖民地的精英们曾经期望将他们自己的地区组织成主权民族国家,以便他们也能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到世界体系中来。对于参与,就像“民族大家庭”一词所暗示的,看来能在自夸的独立自由之上提供安全和财富。

对民族主义精英而言,通向参与的道路是发展的,包含了在他们试图表现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方式上的激烈变化。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这样的变化经常被划归到“文明”的概念中,这种概念提供了一种全世界所有民族都适用的可测量的标准,这些多样的标准包括识字率、铁路公里数、工业产出、男人在穿上大礼服之后如何跳华尔兹,或者他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观的支持率。这种自称的普遍标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理论库用的一部分。这些概念和行动主要是由西方术语来定义却被定性为没有文化上的特殊性,精英们使用这些术语和行动来发动对民族独立权的诉求,并在这些权力被否定时动员大众的支持。各种团体都在从自己个人和民族的角度出发协商要使用哪种标准,他们很少质疑促成这种决定的关于进步的叙事。历史学家忙于修补过的叙事去来适应当下的需求。新民族历史将民族与后启蒙时代进步观联系起来,成为斗争中的主要武器。书写历史是为了提供一个能将他们的民族带离殖民主义的过去、走向富裕和强大的未来的目的性动力,它将所有民族带到同一个叙述体系中,但同时又宣告他们自己的特质,以作为文化独特性和独立性的证据。这种就是至少从 20 世纪初以来在全球使用的民族主权概念的说服力。

但是,这种独立的推动力从来不是没有竞争的过程。除了宗主国的势力不情愿交出主权——就像法国在越南,荷兰人在印尼,以及英国人在印度那样——在民族内还产生了(还在持